

早期现代新儒家的 科学技术观

赵培军◎著

儒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早期现代新儒家的 科学技术观

赵培军◎著

儒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早期现代新儒家的科学技术观 / 赵培军著. —北京: 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12

ISBN 978 - 7 - 5161 - 9698 - 4

I. ①早… II. ①赵… III. ①儒家—科学技术—
思想史—中国 IV. ①B222②N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08402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喻 苗
责任校对 韩天炜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201 千字
定 价 5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以科学技术为主导的西方近代工业文化疾风劲吹，凭其摧枯拉朽之力将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社会作用，推向自我检省的时代当口。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在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都不能忽视同一个问题所造成的影响：面对中西方社会发展的实际差异，对当时强劲迅猛的西方科学技术文化和频现颓势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价值，如何进行评价与取舍。

早期现代新儒家基于尊重中西历史和展望民族未来相结合的视角，虽认为中国脱离当前贫弱状态乃至进一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肯定离不开西方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创世价值，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盲目热衷和迷信这种价值。相反，他们理性认识和分析当时国内和国际发展的弱肉强食新格局，重申以人文关怀的省察态度而对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予以审慎考量。唯其如此，关于如何规避或减缓科学技术推动社会发展同时带来的负面影响，早期现代新儒家则在顺应西化发展诉求的同时，又积极主张重释儒家文化的源头真谛而辨析其是非优劣，重新界定和明确儒家文化的治世价值。所以，早期现代新儒家在中国迫切需要解除国家发展危难之际，形成了“亦中亦西”又“不中不西”的独特科学技术观。以求恢复儒家文化在中国实现工业化进程中应有的社会地位和作用。

早期现代新儒家科学技术观的独特性，不是对西方科学技术文化和儒家文化社会价值的折中或妥协，而是立足特定的国际和国内发展事实。这是辩证分析两种文化所存在的优势与不足，从而真正为中国的长远发展而发挥它们的积极作用。早期现代新儒家坚定地认为，科学和技术本质上是属于不同的认知领域，即使发展到近现代已经具有很多的交叉和融合，但互相所偏重思维领域和实践领域的事实，决定了对它们的

有关功能和作用的评断不能囫圇、含混，只有以有益于人类整体生存和长远利益为前提，才可以对二者的评断有所统一。研究早期现代新儒家的科学技术观，需要厘清他们相对分明的科学观和技术观，既明晰他们在吁求中国发展中积极肯定科学技术的西化态度，也着重反映他们主张不能忽视科学技术所产生的负面作用。换句话说，早期现代新儒家理性分析西方国家引领的工业文明，强调这是社会未来发展不可否认的必然趋势。但是，在实现这种更高层级的文明过程中，产生了诸多具有负面作用的冲击，甚至一些冲击已经构成了对人类整体生存的威胁，这就需要对以科学技术为主导的文明进行完善。

早期现代新儒家为了避免中国的西化发展沦为对西方工业化发展道路的简单重复，最终本质还是在征服与掠夺中实现一种粗暴的社会发展。在早期现代新儒家看来，这样的社会发展即使可以解决国家当下的问题，但无法真正实现民族的长远发展和复兴。为此，早期现代新儒家坚持，要通过重释儒家文化人文关怀源头真谛，以中西文化相济为用的取用方式，使解除中国当下危难与实现长久发展齐头并进，以走出一条真正适合民族发展的工业化之路。

早期现代新儒家西化发展理念，是力求将中西文化相济为用作为引进和发展科学技术的准绳，有其特定的现实条件和理论基础。首先，伴随西方科学技术创造人类工业文明的同时，对人类生存利益的负面作用也在日益凸显，这不仅体现在西方国家的肆意殖民侵略和发动的两次世界大战，也表现为人类对自然由敬畏改为征服的非理性态度。其次，以生命哲学为主的西方反思理性等诸多学术流派的思想，随同西学东渐而一并开始不断影响中国的思想界，这使早期现代新儒家对长于人文关怀的儒家文化有了重释的信心。早期现代新儒家认为，现代生命哲学与儒家文化都极其关注人的现实关怀，都擅长以直觉、顿悟等感性认识方式，注重社会能形成良性、和谐的生存关系，二者所折射出的人文关怀思想才真正符合人类长远生存的需要。所以，早期现代新儒家形成科学技术观的重要支撑点，是西方生命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文化所强调的在社会发展中要以人为本，并且，二者强调的人文关怀思想内容，也成为早期现代新儒家在贯通中西文化时的理论基础。

早期现代新儒家科学技术观，体现出既要吸收西方以科学技术为主

导的创世价值，又要接续儒家文化而发挥其治世价值，由此深深影响了他们重释儒家文化中寻求不同的西化发展实践路径。虽然，早期现代新儒家关于中国西化发展的态度，及对近代西方科学技术的认识和评价立场，在学术界很难被积极的西化派认可和接受；关于重释儒家文化内容而发挥其治世价值，在方法和路径上很难被传统保守派赞同，最终导致他们的思想在当时学术界没有作为成熟的学术流派得到广泛传播。但是，早期现代新儒家在中国的西化浪潮中探求中国未来发展之路而形成相近的思想内容与理论实践路径，反映出他们是要以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研究态度，以关注中国长远发展与人类生存利益为研究目的，并通过一种科学技术观展现人文关怀主旨。他们的思想观点伴随科学技术深入发展而逐渐显示出其前瞻性与合理性，最终让他们被后来的学者普遍认定为现代新儒家学术流派的奠基者。事实上，透视早期现代新儒家的科学技术观，他们是致力于在科学技术与人文社会之间寻求双向、互逆的融合路径，不仅为现代新儒家学派的后继学者奠定了研究基调与理论方向，也为思想界如何调和科学技术与人文两种文化关系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而且，这种科学技术观突破了儒家文化传统科学技术观，从对科学技术认识方面为儒家文化延续与发展找到新的生长增殖点，从而彰显出早期现代新儒家科学技术观超越时空的前瞻意义与历史价值。

在中国追求西化发展中弘扬人文关怀，早期现代新儒家以有利于中国走出当下发展的进退维谷之境，乃至实现人类整体的长远生存利益，在构建科学技术观的内容和投于具体实践时，形成“亦中亦西”又“不中不西”的独特特征。这不仅是早期现代新儒家科学技术观的立足点，也是他们后来具体践行中国如何西化及实现长久发展的标准。对早期现代新儒家各位代表在阐述这一思想主旨及具体付诸的实践进行对比，不难发现他们各自的理论体系及实践操作，都是以追求西化发展中要解决的两个基本问题作为前提：第一，正确认识西方为什么能够出现近代科学技术而率先实现人类的工业文明，这需要中国的学者能对其整个过程有充分的认识，了解西方的历史对实现工业文明所起的作用。第二，正视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的几次接触并没有让中国在发展中引起足够的警醒，反而与西方的发展差距被越拉越大，这其中所出现的原因需要进行深入的分析。

研究早期现代新儒家科学技术观时不难发现,他们并未表现出盲从西化的崇拜热潮,也未独断儒家文化精义而抱残守缺,而是采取“对于外来思想之输入与夫旧思想的如何消化、整理,也应该同时并重”的态度。早期现代新儒家的科学技术观,实质上是对科学技术文化与人文文化各自优劣的理性分析,是调适儒家文化以期能与科学技术文化和谐共存,使两种文化的结合真正有利于中国摆脱当时的窘境并有益于民族长久的进步。此外,早期现代新儒家鲜明的科学技术观,表明其在新时期肩负起重释儒家文化的重担,从儒家文化的内在延续上,接榫并弘扬儒家文化颠扑不破的人文关怀价值,打破了当时中西方以科学技术作为高下判断的唯一要素。他们既主张发挥科学技术的治世价值,也主张发扬儒家文化的治世价值,主张将二者结合,从而对中国的西化与民族长远复兴有所裨益。这种独特的科学技术观,与现代新儒家学派后来两代的科学技术观也有明显不同。

本书的研究首先是受益于我的导师南京大学哲学系萧玲教授的鼓励和悉心教诲,让我能够明确方向和发现问题;其次是得到了南京晓庄学院市属重点一级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组项目组、南京晓庄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科建设项目组的支持。在此付梓之际,向我的导师和学院领导、相关同事表示最真挚的感谢!本书的完成也离不开三年攻读博士学位时,给予我精神鼓励 and 实际帮助的专业老师、同窗好友,还有硕士导师谈新敏和王国领教授的关心,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真挚的谢意!当然,本书能够最终完成要特别感谢我的家人对我一如既往的支持!尤其女儿琬宸的出生,给我带来的喜悦让我充满了动力,帮助我在克服诸多困难的同时也更加执着着学术研究的道路。

我是完全属于半途进入科学技术哲学的学术领域,对该论著所研究内容需要的哲学理论和传统文化知识,在基本功的支撑上都十分有限。但是,自己着实特别钟情清末民初那段科学思想史,尤其着迷当时学者们所持有的西方文化观和传统文化观的激荡与回应,其中仿佛在昭示一种思想力量和精神自信。我基于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的研究方向,决定选择早期现代新儒家的科学技术观,希望能明了他们在当时坚守儒家文化的勇气和魄力;选择以科学技术观作为一种外在研究进路,希望能还原他们对儒家文化如何实现对本土文化承续所留下的宝贵经验。当然,

每一次推敲自己研究的内容时，我总能清晰地感觉到因个人能力和科研水平的限制，存在太多地方需进一步的论证和打磨，甚至有些观点因没有扎实基础作为支撑极易釜底抽薪。所以，在这一段的研究即将结束之际，对书中肯定会存有诸多不足甚至错误之处，恳请专家和同仁能予以批评、指正和包容。

赵培军

2016 年秋于南京晓庄学院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科学技术观研究缘起	(2)
一 科学技术发展问题之思	(2)
二 科学技术负面作用之实	(4)
三 中国西化科学技术之问	(7)
四 科学技术观研究之意义	(9)
第二节 现代新儒家学派之形成与发展	(12)
一 早期现代新儒家形成之历史缘由	(12)
二 早期现代新儒家形成之现实原因	(15)
三 现代新儒家学派发展之实际状况	(20)
第三节 早期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	(25)
一 早期代表人物的定位	(25)
二 早期代表人物的选择	(28)
第四节 早期现代新儒家科学技术观研究现状	(34)
第二章 理论内核：人文关怀的取用原则	(38)
第一节 科学技术应用中的产物	(39)
一 简述中西方思想界对其认识	(40)
二 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作用	(46)
三 对科学技术社会功用的评价	(50)
第二节 科学技术观的思想内核	(54)
一 肯定科学的认识作用	(55)
二 审视技术的实践作用	(62)

三 人文关怀的取用原则	(66)
第三章 理论基础：生命价值的哲学理论	(72)
第一节 生命哲学理论的影响	(73)
一 重识感性的西方生命哲学	(74)
二 体悟生命的儒家生命哲学	(77)
三 生命哲学理论的现实意义	(81)
第二节 直觉主义理论的影响	(89)
一 科学认识对象的有限性	(91)
二 技术应用后果的未知性	(96)
三 人文关怀价值的普适性	(99)
第三节 宋明时期儒学的影响	(104)
一 梁漱溟之百姓日用现代化	(106)
二 张君勱之存心养性现代化	(108)
三 熊十力之体用关系现代化	(110)
第四章 理论特征：中西思想的相济为用	(113)
第一节 彰显西方文化的科学技术精神	(114)
一 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精神的形成	(115)
二 中国西化的历程及其主要目的	(120)
三 塑造中国科学技术精神的条件	(126)
第二节 发扬儒家文化积极入世精神	(134)
一 儒家文化积极入世的处世态度	(134)
二 梁漱溟：现代化之乡村建设路径	(138)
三 张君勱：现代化之民主宪政路径	(143)
四 熊十力：现代化之内圣外王路径	(148)
第五章 理论价值：生存理念的独特思考	(155)
第一节 对同时代学派科学技术观超越	(156)
一 与激进西化派科学技术观对比	(157)
二 与传统保守派科学技术观对比	(160)

第二节 对儒家传统科学技术观的超越	(162)
一 调整传统“道”“器”关系	(163)
二 实现儒家文化的时代衔接	(165)
三 启示儒家文化的增殖研究	(168)
第三节 科学技术观对当代的启示意义	(170)
一 协调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的前瞻性	(170)
二 复兴儒家文化道德与理性的合理性	(171)
三 尝试科学技术与人文互逆的可行性	(174)
第六章 结语	(177)
参考文献	(179)

第一章 导论

19 世纪中叶始，相较于西方凭借近代科学技术为主导的推动力而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中国作为封建国家的翘楚却因为贫弱衰落，遭遇到亘古未有的发展窘境：一方面，因西方诸多工业化国家野蛮地掠夺性入侵，中国几乎陷进亡国灭种之存亡边缘；另一方面，能够拯救中国走出这种危境的核心，却是需要尽快拥有类似西方近代以来所依赖科学技术的工业基础条件。与此同时，近代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推动力也是双刃剑效应，促使世界范围内也在经受前所未有的发展考验：一方面，依赖近代科学技术而率先进入工业文明的西方工业化国家，在推进各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致使本国都几乎出现诸如国家能源问题、环境问题、社会结构性问题等；另一方面，为满足进入工业化发展的需要，这些工业国家肆意进行的殖民侵略和掠夺，也给人类整体生存利益的覆灭带来挑战，尤以大规模、跨地域的两次世界大战为甚。基于这两个大的方面为背景，作为后进者的中国如何认识与评价近代科学技术的创世价值，及如何引入这些科学技术而合理地发挥它们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意义，构成当时中国诸多学者在形成关于对中西方文化认识与评价中有关科学技术观的重要内容。所以，不同学者在中国是否需要西化和如何西化等问题上所持有的科学技术观，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他们所期望的从何种路径使中国摆脱当下困境，并使中国走进什么样的现代化。基于此，伴随西方近代以科学技术为主导的工业文化大量涌进中国，国内学者从不同理论立场及所构建的社会发展目标出发，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科学技术观。虽然，这反映出当时学术界为国家进言献策的活力，但是不可否认其也在认识和评价中西文化及其价值时，给国内的学术界造成莫衷一是的更加混乱局面。

第一节 科学技术观研究缘起

一 科学技术发展问题之思

西方发展在经历近千年的漫长中世纪后,经文艺复兴而开始不断释放人追求自我价值的天性,逐渐激发一些西方的人对自然与社会认识的激情与活力,一改由传统宗教为主导的认识为科学理性的认识。虽然,西方的科学技术在未进入近代之前,已经作为认识方式和实践方式为推动社会发展而履行其相应角色,但基本上还是依赖少数科学爱好者或传统工匠,凭借他们个人的喜好、想象和经验,及所掌握的材料而更多地表现为在较为狭小的私人领域内进行。但是,伴随宗教认识神话逐步被打破,科学与技术作为认识方式进入近现代认识方式的主阵地,因认识对象在空间范围的变化,其研究内容转变为科学理论与科学方法的体系架构,研究者也从少数个体的单打独斗转变为团队合力工作。科学开始从依赖个人的主观想象和思维推演,表现为更强调科学成果的验证及广泛应用和检验,相应地,技术从手工小作坊、单一工匠的个体性劳动转变为机械工具的大规模设计与运用,在实际操作中不断追求精细化和准确化。惟其如此,近代科学技术发展到16世纪之交,开始突破原有的“科学仅作为认识活动和技术仅作为实践活动”的局限,在推动社会发展的需求之下使得二者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尤其科学已不再作为纯粹的思维理论的认识方式,已不断渗透进技术具体改进与发展中,逐步体现出对社会发展的变革意义。从哥白尼1543年发表《天体运行论》至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近代科学与技术的互动性越发明显,科学与技术在相互作用中彼此提高也十分明显,科学与技术的逐步紧密结合开始影响彼此的发展。这样的背景之下,科学与技术不仅使人类认识和实践自然与社会的能力迅速增强,也使更多学科领域和更大应用范围内需要将二者进行交叉融合。基于此,科学理论的丰富需要技术实践的应用为辅助,技术的日益发展也需要更完善的科学理论给予指导,如19世纪法国实证主义的出现,不仅是受益于科学技术变革自然与社会作用力的巨大提升而创造出的丰富的社会物质财富,也是伴随科学技术进步的同时而使得文学、艺术、政治、经济等都进入蓬勃期的社会思想成果。这种

近代科学与技术发展特点的改变,不仅有益于各自的突破而加速自身的发展进程,也从综合角度提升了对社会发展的推动力,直至帮助西方进入了工业文明时代。所以,西方近代科学技术被推送上人类认识方式中的最高地位,开始被作为社会进步与文明发展的准则,甚至被放大到人类生存中的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科学技术迎刃而解的迷信程度。在西方诸多国家进入工业化之后,科学以其显性成果的技术在社会实践中的高效作用力,被正式作为认识自然和推动发展的正统,最终获得了人类诸多认识方式中的最高话语权,彻底改变了在中世纪时期还是神学婢女的地位。

一定程度上讲,因为科学技术在交叉的发展过程中已经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决定它们的发展已不能缺少对方的提高作为支撑,诸如新科学理论与科学方法的形成,能够促进技术成果的不断创新。反过来,伴随技术作用于自然或社会程度的加深,在扩大认识范围中越发有益于新的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的出现。从科学认识论的理论角度进行分析,西方自近代开始的科学与技术发展,无论从其所创造出的显性的物质成果,还是对政治结构、社会文化等的隐性关系的影响,所体现出的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影响的功能,都远远超越其他任何认识方式产生的效果。惟其如此,要在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中评价科学技术所产生的影响,任何人都不能仅从科学或技术的单一方面的影响而得出结论,取而代之的是必须将科学技术作为统一的整体,对它们共同作用的效应进行评断。

伴随近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对自然与社会的积极创造价值,已经不能单一地将其归功于科学或技术。同样地,因近代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推动力不断发挥,对自然与社会发展也造成诸多负面影响,这也不能单一地归责于科学或技术。唯其如此,科学技术发展到工业文明时代,也形成一个挥之不去的附属观点:对科学理性价值产生怀疑,必然会牵涉对技术实践价值的怀疑;对技术实践价值的怀疑,也终会牵涉出对科学认识价值的怀疑。换句话说,科学技术的发展到近代以后,在推动自然与社会的发展而具有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会产生出直接的或潜在的负面作用。对科学技术这种二重性作用的认识和评价,过于倚重任何一个方面都将不利于人类的生存利益,伴随工业文明的建设对

科学技术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如何对二者结合后产生的价值从整体角度进行评价与取舍，是真正发挥科学技术造福人类长远生存的重要前提。所以，科学技术自近代开始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且西方诸多国家在科学技术变革中已牢牢掌握、控制世界的中心话语权，这虽然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达成普遍的共识，但是，反思科学技术仅仅是作为人类认识的方式之一，它们也不可避免地因自身具有的领域局限而不能无限放大其作用力，要正视它们对自然与社会所造成的负面作用。所以，对科学技术作用所持有的认识与评价，随它们对人类社会生存方面的不同影响而有了不同的评判，甚至明显地引起了有关对其价值的肯定与否定双重声音。关于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生存影响而主张对它们进行积极调适的观点，从根本上看，则是以对它们所存在的负面作用的认识作为前提。所以，面对近代以来由科学技术推动社会发展进入工业文明而出现的负面产物，诸如国家间的覆灭性战争问题、忽视对自然与社会的保护等问题，则形成了对科学技术及其社会价值该持有整体角度的理性评价观点。关于科学技术发展而引发的诸多思考，尤其如何认识和评价其在人类社会中所具有的价值，在早期现代新儒家看来，过于乐观与盲目悲观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

二 科学技术负面作用之实

近代科学技术经过 300 年左右时间，推动西方诸多国家的社会发展的同时，其所产生的影响也近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伴随这些国家工业化的继续发展，不仅反哺和催化科学技术的发展进程，也对科学技术的依赖程度表现出有增无减的态势。西方率先进入工业化的国家，是通过实现了近代科学技术并继续推动其进步，使得国家进入到一个物质与精神都丰富的时代，故它们的发展和生存利益都与科学技术发展程度紧密相关。然而，科学技术作为人类的认识方法与实践方式，也会受自身效用范围的局限，在实现国家发展同时也会存在相应的不足。这些工业化国家的一些学者已经发现，科学与技术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无形之中又助长了人类对它们的盲目崇拜，甚至在与其他认识方式对比中将后者尽可能纳入科学范畴中予以考量和评价，最终赋予了科学技术无以复加的神圣权威的地位。当人类历史开始进入到 19 世

纪，利用科学技术在全世界范围内攫取物质财富，成为率先进入工业化国家的主要发展方式之一，甚至被认为是一种正常的、合理的人类竞争行为。这些西方国家利用科学技术及其成果，不仅肆意获取自然界的矿藏资源，也残酷剥削和掠夺落后国家或地区的各类资源，“视今世所谓文明先进者，利令智昏，抢夺是务，其高下果何如耶”^①。一时间，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优劣对比，很大程度上已完全依赖科学技术的水平，衡量不同国家之间的先进与落后、不同个人在社会中拥有地位的高与低的核心，其关键点就在于胜者对科学技术的掌握程度。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国家无疑是最为成功的，其获得了世界中心话语权地位，西方优越论也应运而生。

当西方国家创造出工业文明后，更多的人开始普遍将科学技术看作推动社会发展的关系要素，认为自然规律、社会现象以及人的思想和行为等等，都可以因科学技术的存在而做出最权威的说明。更有甚者，认为人类的道德、伦理、正义等虽不具有自然规律但亦可被证明，对它们的认知和衡量同样可以被纳入到科学技术所制定的标准之中。早期现代新儒家认为，这是无视科学技术有其自身不足的极端的唯科学主义思想，它不仅忽略科学技术给人类生存可能带来新的无穷无尽的生存难题，也无视科学技术对人类精神生活的认识有先天不足的事实，梁漱溟面对国内过于夸大西方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时提醒道：“近世西方人的心理方面，理智的活动太强太盛，实为显著的特点。在他所成就的文明上，辟创科学哲学，为人类其他任何民族于知识、思想二事所不能及其万一者。不但知识思想的量数上无人及他，精细深奥上也无人及他。然而他们精神上也因此受了伤，生活上吃了苦，这是十九世纪以来暴露不可掩的事实！”^② 在早期现代新儒家看来，中国追求西化而真正有益社会良性发展，则必须要批判国内所出现的过于盲目崇拜科学技术及其魔力，极力反对将科学技术的作用力可以在人类生存空间大行其道，直至可决定人的生存命运等错误观点。

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所具有的推动力，是伴随科学技术自身发展而

① 熊十力：《论六经·中国历史讲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0页。

② 《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91页。

不断被发现与挖掘的，但因为人类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发挥其推动力，而忽视了对它们本身局限性的认识，从而在标榜科学技术为最高权威后，弱化甚至排斥其他认知形式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力，最终难免在科学技术以推动物质层面进步的同时，也给社会发展中诸如人与人、人与自然等的关系埋下恶果，“自然科学的发达竟把包括科学者本人在内的人类，导入灭亡的危机”^①。事实上，伴随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人与自然的存在关系也在不断接受考验，集中表现在自然原有秩序在工业发展面前被打乱，人在自然中的生存价值衡量标准很难得到统一。以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为主导的工业文明，实质就是依恃科学技术及其成果的应用，在自然面前一改历史往昔的敬畏心理，将人类翻转成为自然的征服者，最大程度开掘自然资源而满足人类社会发展的需求。所以，工业化的实现程度越高，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失衡状态越严重。毕竟，科学技术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人类生存所依赖的自然环境，诸如资源短缺与生态破坏等问题，已然成为工业文明进程中不可回避的主要难题。再有，近代科学技术无限放大人类生理功能的极限，帮助人类提高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这已触及自然界的宏观和微观领域，但科学技术对一些社会关系或个体心理等问题的解释，还是更多地借助惯有的定性或定量的论证，并以解释自然现象和推演自然规律的方式强行解释，在根本上还是对这些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问题很难形成说服力。最后，由于近代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显性效果不断呈现，佐证了物质文明的进步是依赖科学技术作为支撑。因此，以科学技术作为评判社会发展水平高低的至高标准，开始在工业文明时代创造出一种片面价值观。早期现代新儒家认为，即使基于不同的立场理解这种价值观，将都无法剥除科学技术这一重要的因素，但其促使人在强调“外在物质”的追求中而少了“反求诸己”的反思。这样的价值观不仅会导致人类会将发展过于集中在眼前，难免因短视而导致诸如国家侵略、生态危机等发展问题，也会促使人类在社会进步衡量标准上出现严重的偏差，使得道德、正义与伦理等衡量价值在社会发展中逐渐隐退，最终影响到社会发展对个人价值和生存意义的界定，这同样会给社会发展带来难以解决的问题。

^① 张君勱：《儒家哲学之复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0页。